

# 略论《儿女英雄传》的两性格局与创作心态

武霖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儿女英雄传》讲述了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一夫双美”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十三妹,集“儿女真情”、“英雄至性”于一身,作出了种种侠义之举;而男主人公安骥却几乎毫无作为,仅止于被动地接受女性的付出,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女强男弱”的两性格局。这与西方同类叙事文学中的两性格局大相径庭。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作者的创作心态,并借助女性主义视角来解读这部小说中“女强男弱”格局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儿女英雄传》;两性格局;创作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73-04

《儿女英雄传》是晚清旗人文康所著的一部通俗章回小说,又名《金玉缘》,是反映作者文康“理想”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常常被归入侠义小说的范畴,而事实上,如果剥去侠义的外衣,它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才子佳人小说:才子多半是年少才高,风流倜傥,然而又时运不济,仕途多舛;而佳人则必定是名门闺秀,美貌聪慧,才气不让须眉。才子合遇佳人,情愫暗通,而又恪守礼教,不越雷池一步;中间又有小人作祟,多见曲折;最终是好事多磨,双美归于一夫,才子功成名就,举家光耀门楣。《儿女英雄传》虽未能脱其窠臼,却显得非常不同:首先,文康为这个陈旧的故事披上了侠义的外衣,使得女主人公十三妹(即何玉凤)在一群整日吟诗作赋的才女当中显得卓尔不群,独具个性。其次,世情描写的加入、故事情节的相对复杂和人物塑造的相对真实,使得小说比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更加有深度和可看性。再次,小说中情节多处与文康经历相契合,作者以此抒怀,别有感慨,亦非普通的才子佳人小说可比。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中的两性格局呈现了非常突出的“女强男弱”的现象。纵观全书,最光辉的人物当非十三妹莫属,最出彩的地方则是十三妹救难能仁寺,只身斗恶僧的篇章。有学者试图用女性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这种“女强男弱”现象,认为远古的初民对女性的崇拜,经过千万年的积淀,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随着文化的传承被继承了下来。当这种“女性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处于深深的压抑中时,它就会通过梦或艺术来体现,表现在文学中,就置换变形为比男子强大的女性形象,并为人们所接受<sup>[188]</sup>。然而,女性崇拜并不只是中国才有,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都应该有此意识的遗存,那么,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爱情叙事中的两

性格局是大相径庭的呢?文康的这部“抒怀”之作真的是一曲充满了女性崇拜和女性意识的赞歌吗?

## 一 令人迷惑的表象:女强男弱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文康同时将万丈豪情、忠孝节义、机智聪敏和绝世美貌赋予了十三妹。男主人公安骥苍白无力,迂懦无能,动辄哭泣,有关他的描述性文字时常充满着调剂和搞笑的意味。虽然他出身世家,孝顺父母,然而除了肩负千金往淮安救父这一壮举之外,他在小说中几乎是毫无作为。在光辉四射的十三妹面前,他是如此不值一提。也许作者是想将他当作一位理想的男性来描述的,正如小说中的女人们口中艳羡的述说一样,然而他或许并未料到自己塑造出的是这样一个颇具女性气质并依赖女性的男子,以至于让读者对安骥日后的位极人臣的最终结局感到怀疑。

小说题目中的“儿女英雄”在实质上也是专指何玉凤。在这里,女性作为正面并完美的绝对主角出现在小说中,而男性蜕变为苍白的陪衬者并被女性的光辉完全压倒。不过“女强男弱”现象并非文康时代才有,这在中国历代的小说中并不罕见。只就天赋异秉、怀有异能的奇女子来说,汉魏有《搜神记》中的李寄,唐有传奇文中的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宋元有《杨家府演义》中的穆桂英,清有《征西全传》的樊梨花。即使是《平山冷燕》一类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也是以佳人更为多能。在这些小说中她们往往是正面的,优于男性或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主动追求男性并承担爱情与婚姻的全部责任;男子的形象要么是反面的,要么是正面而性格较懦弱,而且总是被动接受女性的情感和献身,尽可能地逃避责任,常常依靠女性的帮助获得幸福。<sup>[186]</sup>女性总是被书写者表现得相对鲜明、丰满、动人,这就是为什么被人们千古传诵的文学形象往往是女性的

原因。

《儿女英雄传》自然是这个传统的承袭者,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女强男弱”的格局尤为明显,甚至有些夸张,因为他把女性上升为秉“儿女至情”和“英雄至性”于一身的超绝的“英雄”,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深深的疑问:小说本身由男性作家所书写,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两性格局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男权中心是根深蒂固、不可变更的,就如同《水浒传》一样,如果是为英雄作传,那么为什么不以一位男性作为英雄主人公,反而以女性作为英雄主人公呢?笔者认为这个原因要从创作者的身上去寻求。也许文康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并未注意到为什么他的前辈们如此钟爱女性,他只是个亦步亦趋者;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这部小说当中他倾注了自己的理想抑或是白日梦。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作家的“一篇创造性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sup>[3]36</sup>,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男性作家们。同样,文康作为传统的承袭者,也不可避免地在做这样的白日梦。

## 二 褪去赞誉的外衣:男性作家的白日梦

尽管这部小说充溢着对女性的赞誉之词,似乎是一曲对女性的赞歌,然而真实往往隐藏在表象之下。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小说戏曲,或是说书平话,都在真实地表达着人们潜意识中最深层的、不可企及的愿望。男性所渴慕的即是不可企及的性、物质和权力,文学创作则真实地传达出他们的白日梦。在中国的文人们看来,一个好的妻子或者情人应该集美貌、美德、智力和才能于一身,妻子或情人越完美,就越能够衬托她身后的男人的高度。这种心理使他们在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些个性鲜明、突出、现实中少有的女性形象。文康出身于簪缨门第,家世显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然而他却仕途蹭蹬,加之“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晚景颇为凄凉。此时的作者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在生理和精神方面都处于深深的压抑之中。于是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需要便被唤醒,并在他的笔下幻化出一个完美的侠女——十三妹。

出于想要改变并控制女性的渴望,男性作家往往将自己笔下的女人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不仅在性爱方面,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造就”她们,好使自己居高临下地观赏自己的作品。因此,无论是小说戏曲还是香艳词赋,其中的女性形象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男性意识的烙印。《儿女英雄传》也不例外。在小说中,无论是十三妹,还是其他女人身上,

作者文康都不遗余力地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着他们的形象,并刺入他们的本质,其中尤以十三妹为甚,其印记也最为鲜明。她所具有的“儿女真情”和“英雄至性”不过是封建纲常的符号,被杜撰、被图解的痕迹明显存在。作者让人物的性格和行动消融在纲常名教的教条中,以至于失去了常态,成为后人频频诟病的原因。十三妹救安骥于能仁寺,双方都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即使在患难中也不失方寸,不乱一礼。后来她于安骥结婚前提出的“无父母之命”等五条拒婚理由,也无一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符号演绎。而她一旦恢复为何玉凤,嫁了安骥,就由一位果敢刚毅、豪爽泼辣的女侠,变成一个热衷科举、追求功名、恪守三从四德的贵妇,前后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随着向世俗的回归,她的侠义性格在瞬间消泯。

## 三 深层的男性自尊:征服不驯服者的欲望

出于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男性渴望征服并不驯服的女人。他们认为女性尽管在某些方面表现强势,但最终总是会臣服于男性的权威,她会反抗并会有理智地争执,但是她最终会承认男人是对的。这极大地满足了男性的虚荣心。这在《儿女英雄传》中安学海“整顿金笼关玉凤”一节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在小说中,文康给予女性的赞语要比给予男性的要多得多,十三妹在小说文本中更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强势。不过尽管如此,小说中真正的权威还是由男性来担当的,那就是安学海。他是一个完美的儒士、忠诚的臣子(虽然自己挂冠,却鼓励儿子求取功名)、清廉爱民的官员、重仁义的异姓兄弟,还是一个神机妙算的军师。他为文康代言,实质是文康的自诩。他在家庭中占领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掌控着所有在自己预料之内的事情。他摆布连环计来收束十三妹,先是晓之以理,然后动之以情,终于成功地将她锁入婚姻的金笼中。虽然这个阴谋是以张金凤来做收稍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张金凤作为孝顺的儿媳和贤惠的妻子,事实上是男性忠实的并受到称赞的奴仆,她就是安的代言人和助手。

而在十三妹的方面,她曾经想逃脱安的控制,却选择了屈从;她曾经机智地进行反抗,却以认错告终。这也是为什么十三妹比张金凤更加具有挑动人们(尤其是男人)好奇心的原因所在。男人所冒的险与他的虚荣心以及他最终得到的赞誉是成正比的,征服一个不驯服的十三妹比征服乖顺的张金凤更加令男人向往之。她的不驯服是作者延展故事和制造波谲的方式,同时也让男性权威的主

动性得到了无限的发展。她尽管神通广大,却还是服从了男性的权威,并心甘情愿做出改变。安学海和十三妹似乎是两个极端,两个人的针锋相对所引起的戏剧性的冲突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但他们又都代表了文康所信仰的礼教,又都是在为所谓家国进行不遗余力的服务,在这上面两者得到了成功的调和与互补。安骥作为“一龙双凤”格局中的男性中心,他和父亲其实是一体的。安学海是两性格局中的权威,而安骥是他的无可争议的继任者。这个结局无疑是符合了文康的希望,因此,尽管小说在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处理上不无突兀和粗糙之处,却完全合乎了男性话语的逻辑。最终,十三妹的武器和坐骑为一场蓄谋已久的婚礼所剥夺,自此之后,她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将隶属于丈夫,并力图做一个“贤妻”,并成为他最珍贵的财产。

#### 四 尴尬的困境:文人的依归心态与自卑情结

中、西方同为男权社会,然而对于爱情与婚姻的态度,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双方却有天壤之别。在爱情叙事文学中,西方的女性多是弱者,依靠王子或者骑士的救助而获得幸福;而中国的女性则多是扮演救助者的角色,或用金钱,或用武力,或用智慧,帮助才高八斗而手无缚鸡之力的男性获取权势和富贵。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两性格局,其中固然有中、西方传统观念、道德伦理等不同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在于中国古代文人的独特而尴尬的地位。<sup>[216]</sup>

中国的专制历史阉割了许多文人,使他们在心理上成为弱者:既缺乏独立谋生的勇气和手段,又盼不来命运的青睐;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他们都属于弱势阶层,处于尴尬的中间状态,这造成他们强烈的攀附心态和爬升欲望,而这种艳羡和依附一旦落空,又很容易转化为一种自卑情结。当这种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转化为求助意识的时候,文人们就在文学创作中杜撰出一些“他力”,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女强男弱的畸形格局。<sup>[215]</sup>美貌且全能的侠女十三妹便是这样一个男性话语下的产物。安骥手无缚鸡之力,救父路上屡屡遇困,多亏有智勇双全的十三妹相助,才从危机和险境中解脱出来;而且,也是出于这个女恩人的意愿,许给他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张金凤。十三妹实质上承担了本该由安骥承担的责任。

然而,中国文人在“幻想借助‘他力’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的弱者地位”<sup>[215]</sup>,从而获得心理的平衡和慰藉。“他们从佳人主动追求才子的虚构中,得到虚幻的满足”<sup>[215]</sup>。在《儿女英雄传》中,言

情的成分似乎并不多,早在“缘起首回”中,作者就借助梦中的幻想奠定了这个毫无悬念的“一龙双凤”的夫妻格局。这就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作者是按照天命观来机械地安排这个既定的婚姻格局的。然而小说中的一些细节却让人生疑。十三妹看似对安骥毫不动心,却在能仁寺强硬地为安骥与张金凤撮合婚姻,这件事情在当时用安骥的话来说就是“没要紧”。尽管十三妹为自己强为媒妁的行为找到了种种的理由,还是让人觉得牵强。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她在内心深处是被安骥所吸引的,表面是将张金凤许嫁,其实暗合了将自己许嫁安骥的潜意识(她和张金凤长得一模一样)。她在扶母亲灵柩归家的途中所做的骑跨白马的梦,也暗含了性的意味(安骥属马,他的单名“骥”也是骏马的意思)。另外,在能仁寺时,十三妹将小便溺在洗脸用的铜盆里之后,并没有及时倒掉,而是将它放在了内屋,致使不知情的安骥在里面洗手,这个不合常理的情节所造成的性的意味最为强烈。而作者文康对这一切自然是了然于胸的(这在后来张金凤劝婚的情节中,作者借张的利口明确了这一点)。这样,十三妹的逼婚实质上是她对安骥的诱惑,不过是换了一种面目和方式而已。作者显然有着对女性主动追求的期待,但他只是通过细节进行了含蓄的表达,并表明男性始终是不必为爱情与婚姻费心的。与此同时,作者还在小说中强化了男性在女性诱惑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作为依附者,中国的文人需要借助女性的优秀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地位,因为他们缺乏证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

#### 五 结语

作为小说的操刀者,文康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对于他笔下的人物来说,他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部小说中,文康式的男性话语随处可见,不厌其烦地表达和宣传着他的道德理念,并不遗余力地构建自己的白日梦。他的白日梦的支撑一半是他的道德理念,另一半则是他的深层欲望,用以弥补他现实中无法满足的生理、权力、子嗣、物质等需要,特别是精神深处对女性的依赖和渴望。也许文康的本意并不重在表现女子,而是要男女并重,甚至是要最终来表现男子的,但在客观上却显示为女强男弱。因为对完美女性的渴望,使注意形成一种焦点,时时在脑海中显现,故此作者在无意识中就将女性塑造得比男性更丰满。只有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和占有物的完美女性,才能够在性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完整地满足男性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无疑就是梦想的满足。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田富军,杨学娟.中国古代文学“女强男弱”现象成因的原型批评阐释[J].宁夏大学学报,2003,1:87-95.
- [2]王萌.论中国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两性格局与文人心态[J].中州学刊,2003,2:56-60.
-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C].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28-38.
- [4]文康.儿女英雄传[M].上海书店,1981.
-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6]王伟康.鲁迅与儿女英雄传[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45-50.
- [7]田富军.论古代文学中“女强男弱”现象的心理成因[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2:52-55.

## On the Structure of Both Sexes and Writing Psychology in *The Hero Legend of Shi Sanmei*

WU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novel of *The Hero Legend of Shi Sanmei* tells a story which fixes up the hopes of Chinese tradition literary men. In the novel, the heroine Shi Sanmei, had a tender heart, and she was very chivalrous and always ready to help the weak. But, the male lead, An Ji, was very weak, and he was always dependent on the help of Shi Sanmei to get over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This is a classical structure of “Strong Female and Weak Male”, and it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into the psychology of the writer, and uses the feminism theory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Strong Female and Weak Male”.

**Key words:** The Hero Legend of Shi Sanmei; The Structure of Both Sexes; Writing Psycholog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72页)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V.S.奈保尔.黑祸:伊夫林·沃的反讽[A].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V.S.奈保尔.河湾[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4]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5]朱光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A].朱光潜全集(第二卷)[C].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 Cultural Fusion and Loss in *A Bend in the River*

TONG Yi-fei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Becaus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many independent and special cultures have been melted step by step. As time goes on, the fusion and loss of culture have stood out. Those originally independent and intact and special cultures have been undergoing the law of the jungle. In *A Bend in the River*, V. S. Naipaul shows us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this fight.

**Key words:** Culture; Fusion; Loss; Shock